

「長時間」下的世界政治與二十一世紀初

人類的政治範式變遷

◎ 程亞文

對於現代世界來說，1914年6月28日，奧匈帝國王儲弗蘭茲·斐迪南大公及其妻子在波斯尼亞首府薩拉熱窩遇刺一事，永遠值得人們反覆提起，正是它直接導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旋即發生。無疑，作為刺客的塞爾維亞青年弗里洛·普林西普與作為受刺者的奧國王室大公，無意間共謀「規定」了此後的人類經歷。然而，嚴肅的歷史學家其後在檢梳人類生活的前因後果時，卻始終又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如果沒有塞爾維亞青年的行刺事件，那場慘絕人寰的世界大戰是否就可以避免呢？

歷史學家們為此爭論不休。結合《凡爾賽和約》明確認定這場戰爭是「由德國及其同盟國的侵略」而引起的一項條款，在一戰結束之後的數年之內，數以千計的文章和著作發表問世，從不同的角度對戰爭的來龍去脈爬梳辨難。到二十世紀30年代中，歷史學家們開始轉移思考方向，不再一味關注「戰爭罪行」、而注意起引起戰爭的歷史條件。大多數歷史學家後來傾向於認為在戰爭的直接原因之外，一戰之前數十年裏一直起作用的背景原因，才真正是歷史的推動力量。這些背景原因按美國歷史學家斯塔夫里阿諾斯（Leften Stavros Stavrianos）的歸納，乃在於四個方面：經濟上的競爭、殖民地的爭奪、相衝突的殖民體系和勢不兩立的民族主義願望。¹

我們不僅要看到歷史中的大事件，還更要看到歷史中本來就有的發展趨勢。對一戰起因的研究所得出的基本結論，勿庸置疑與法國「年鉴學派」所主張的歷史觀念不謀而合。身為「年鉴學派」的掌門人之一，一代史家布代羅爾（Fernand Braudel）不止一次強調：「人類若不聯繫過去，就幾乎不能懂得現時。」²布羅代爾因此提醒人們不要單純把視野只放在歷史中的大事件，而更多地，要致力於去發現「歷史的結構」。甚麼是「歷史的結構」？「實際上就是不受急風暴雨（或用湯因比的話說，『急進和猛退』）的影響而長期存在的東西。」³

那麼，決定一戰「必然」現身於人類生活的「歷史的結構」又是甚麼呢？到一戰發生的時候，正如斯塔夫里阿諾斯所說，歐洲已以德奧為一方、以英法俄為一方，形成了相互對立的聯盟體系，這種衝突性聯盟體系的產生，意味著維持歐洲均勢為時一百年的梅特涅體系走向瓦解。在拿破侖戰爭之後的百餘年間，由奧匈帝國首相梅特涅精心構築的維也納會議體系，曾經長期保證了歐洲的和平，和平的得來按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的總結是賴於三大支柱：與法國懷柔修好；維持歐洲均勢；對正統觀念的共識，「它結合了法統與均勢、共同價值和均勢外交。共同價值局限了各國要求的範圍，均勢則限制住她們堅持要求的能力。」⁴在

維也納會議後所形成的歐洲協調，曾有力保證了歐洲大國間的共識和避免了國家間的一味敵對，但到十九世紀末以後，隨著經歷兩場戰爭的普魯士德國上升為歐洲第一強國、並拋棄俾斯麥的克制政策而轉向單純的實力政治後，歐洲協調兼因君主制正統主義共同價值觀的式微，開始失去其原有效力，到1914年一戰爆發的二十餘年時間內，普魯士德意志的強勢威脅性外交政策「居然促成了化敵為友、化友為敵的一百八十度大反轉」⁵，俄羅斯這個曾經的三皇同盟的成員之一不再與普魯士繼約，英法俄這三個一貫互相為敵的國家竟然攜起手來結成了同盟。當這種相互衝突、而又沒有彈性的聯盟體系取代歐洲協調而成為歐洲政治的新現實時，整個歐洲其實便已坐在了炸藥包上、只差了一根火柴。而斐迪南大公的遇刺則劃著了火星。

一戰的爆發使人們看到了布羅代爾意義上「歷史的結構」的規範作用。但是我們的考慮並不能到此為止。為甚麼一戰前的歐洲政治中，會存在這種「歷史的結構」呢？「大事件」又是如何與「長時間」即「歷史的結構」產生交相作用？我們首先必須理解兩個現實。

其一是國家追求的常規性。當那位聲名赫赫的美國「海權論者」馬漢(A. T. Mahan)提出他的宏偉理論的時候，這位精通歷史的軍事學者曾經特意指出，任何具有自身歷史文化傳統的國家與民族，在它的國家民族追求中，都會存在「長期性的考慮」與「短期性的迫切要求」，「在某一時刻，長期性的觀點要服從於短期性的迫切要求，但一旦危機過去，國家就應該高瞻遠矚了」，因此，一個國家的戰略決策應「將長期性的觀點與短期性的觀點相結合」。⁶馬漢所說的「長期性的觀點」也就是國家民族的戰略傳統，它是對國家民族利益的穩定性的認識與追求，一旦形成就很難發生根本的改變。

其二是世界政治的範式變革性。當那個贊同歷史循環論的哈佛大學政治學者亨廷頓描繪冷戰結束後的世界政治、提出人類政治正在進入「文明衝突」時代的時候，他同時指出世界政治存在著範式轉換，在舊的、以意識形態為最主宰的世界政治範式失卻效用之時，生存於舊有世界政治之中、一直隱而不彰、但又一直在尋找突入歷史前台的次範式，也由隱到顯躍升為世界政治的新主角。在亨廷頓的觀念中，始終存在著隱範式與範式的角逐較量，它使國際政治經常性顯現出常規秩序與異態衝突。⁷

以上兩個規範性思考框架為我們考察一戰提供了更好的資源。自1648年《威斯特伐和約》簽訂、世界史進入國家主義時代以來，歐洲世界中的那些具有歷史文化延續性的大國，都在不斷的國際博弈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戰略傳統，晚近以來的歐洲政治，實際上也就是這些不同的戰略傳統與戰略思維間的互動。當時刻防止歐洲大陸出現霸權國家的英國、無時不擔心著中歐地帶被一個強大的國家所主宰的法國、經常性地提防被東西兩面的地緣戰略棋手聯手夾擊的德國、總在感覺著不擴張就足以保證國家安全的俄羅斯，一起在歐洲政治中交互對奕時，歐洲政治常規性地表現為大國間的合縱連橫，而如果有相似的價值觀作為共識——譬如三十年戰爭之後個半世紀的國家至上信仰、維也納會議之後對歐洲正統主義的尊重、二戰結束後西方世界的民主自由理念共同等，歐洲政治就會常規性地成就某種富有效果的歐洲協調即國際機制或國際秩序。而一旦共識失效、均勢破裂，歐洲政治則不可避免硬化為勢不兩立的兩種力量間的對抗，直到一方在競爭中取勝重新制定新遊戲規則——此即亨廷頓心目隱含的「常規秩序與異態衝突」。

每一個大國都有將它的戰略傳統推向極致的自然傾向，跨國性共識、及共識下的互為制約機制的存在，是將大國戰略傳統的沖擊力約束一定範圍內、不至於構成破壞性因素的源泉所在。如果價值共識失靈，抵制大國意志越界的閥門也就隨之打開，總有個別大國會躍躍欲試

誇張性地展現其戰略意志，在此情況下，舊有的「常規秩序」就將無法維持。一戰前夕歐洲正統主義的消亡、及普魯士德國的無限度實力政治，正是將國家追求的常規性表露無遺，它所引發的一個直接結果就是原本多元、富有彈性的大國結盟體系的硬化。與正統主義共時生存、促使聯盟體系產生的那種處於次範式地位的力量，在1890年後的歐洲因此找到了成為顯在的機會，而普林西普的那把手槍則將這一機會由可能化為現實。「大事件」沒有「改變」歷史，但是激發了歷史中本就存在的意志即「歷史的結構」，本來隱晦未明的事物因此被催化正式明了於天下，戰爭便自然而然不再可以回避。

如果抽取馬漢的時間概念而擴大他的空間概念，將他所說的「長期性的考慮」推廣到世界政治而非國家的意志；如果延用亨廷頓的空間概念而拉長它的時間概念，將他心中的「常規秩序與異態衝突」擴展到「長時間」，我們將從漫長世界史尤其中近五百年來的世界史中，看到這樣一幅世界政治圖景：由於主要國家民族的戰略追求是歷時而常在的，而且近幾百年來，活躍於世界舞台上的主要國家民族是穩定存在的，由這些國家的共同活動所形成的人類政治生態系，其結構與趨向實際上也經常性地保守有某種常規。布羅代爾和沃勒斯坦其實早已從另外的層面討論過這個問題。他們所相信的過去、現在與未來的關聯即「歷史的結構」，據他們的考察實際上是實體性的，究人類生活史而言，如他們所說的那樣，存在過多種相對穩定的世界體系，而從近世來論，主要的又在於兩個：歐洲國際/世界體系和東亞國際/世界體系。歷史性世界體系的存在，也決定了人們眼中的世界政治存在某種常規。就近世以來的歐洲歷史而言，這種常規乃是：1、內向化的政治選擇；2、國家自主傾向；3、國充當核心國家的志向。如果再加上其它歷史性世界體系，放到一起來，則還應有另一種常規：4、地區化的理想。

二

人類史無時不在受著這種常規或說「歷史的結構」的支配，在歐洲一隅，它使歐洲政治的千變萬幻，總受著一條大致相同的繩索的牽引。今天的人類政治能逃脫這種宿命嗎？

不久前巴格達廣場上薩達姆雕像被美英士兵無情推倒在地的場景，正在給這個世界培養起一種價廉物美的樂觀，一個消滅仇恨與動盪、而走向秩序與和諧的中東世界在不久的將來預計將會呈現到人類面前。在整個世界都在為美英聯軍的軍事勝利和中東的美好未來而作良好考量的時候，那些更為重要、更可能深刻影響人類生活的事情正遭到無情忽略。伊拉克戰爭前後所展覽無遺的「美歐分歧」以及戰後大國間的合縱連橫，究竟喻示了全球政治的何種變化，以及變化將會展開到甚麼樣的幅度，這樣的關於世界整體的觀察與思考，其實，也到了更需要予以深切關注的時候！

也許，這樣的考慮是非常必要的：冷戰結束特別是「9.11」事件、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後的人類世界，正在顯著地發生著變化，人們通常所說的世界政治或者國際政治，也已經顯示出了與冷戰結束前、甚至與「9.11」事件前大為不同的圖景。如何看待人類政治的那些變動？這些變動將使人類生活邁向何方？世界各國將從中獲得甚麼樣的「機遇」或者會面臨甚麼樣的危險？

在觀察現實與預測未來之時，人們總喜歡從往日時光來尋找依據與方向感，很不幸，它常常都是靈驗的。伊拉克戰爭之前引來世人密切關注的美歐爭吵、以及戰爭之後大國之間的面和心不和，容易使人想到人類過往史中的一些類似場景，尤其是一戰前的世界政治。

伊拉克戰爭一如普林西普的手槍，已經將舊世界中潛藏的勾心鬥角和盤托出而盡覽無餘，當下的美歐分歧使人們驚呼傳統的大西洋聯盟甚至歐盟即將破裂，美利堅國家一味逞強顯示實力政治、法德比聯手反對北約在戰爭期間保護土耳其、戰爭之後法德俄三國頻頻晤會、法德比盧等國集會討論歐洲防務的情景，都讓人感受到與一戰前夕普魯士德國因夸耀自身實力而化友為敵、及德國之外國家化敵為友的經歷庶幾相仿。如一戰前夕一轍，當下世界政治正表露出兩個關鍵性特徵：1、維持西方世界互相協調的共有價值觀業已破產，基辛格所期望建立的民主共識，在冷戰結束以後民主自由價值觀不再受到挑戰時，已不再足以凝聚不同的國家意志；2、維持半個多世紀的美國領導下的跨大西洋聯盟體系正在內部分裂，世界政治重新回到傳統的大國政治時代，它的基本表現是世界政治權力的分散化。

冷戰終結的沖擊力勿庸置疑不容低估。以往的那種以市場經濟、民主制度國家體系為一極，以計劃經濟、社會主義制度國家體系為另一極，兩種社會制度與意識形態間的對立在世界範圍內已不復存在，以這兩種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作為號召聯盟、合作或者對立的舊日政治範式已不再能起作用，那些曾因共同的「反共」價值觀而集結為一體的國家特別是大國，它們之間的舊情誼便已成昨日黃花。當下時刻的美歐分歧、及世界範圍內的大國合縱連橫，所表演的東西因此不是別的，是世界政治又復歸常態。相對來說，冷戰期間以某一超級支配性國家為領導、其它國家作為僕從的狀態，在近500年裏其實是少見和非常態的，這一點對歐洲政治來說尤其為是。所有的大國都希望建立霸權，但所有的大國又都不希望自己被霸權力量所控制，除冷戰時期之外，《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簽訂以來的歐洲和人類世界，從來沒有出現過能夠支配其它大國的真正的霸權國家。

世界政治重新回到常規的動力，仍蘊含於既往的人類經歷即「歷史的結構」中，其主要因緣，是近半世紀以來一直處於沉寂狀態的歐洲世界體系，和近一個世紀來長久默默無聞的東亞世界體系，在經受毀壞後的重建復蘇、恢復往日元氣後，又在部分復活自身歷史傳統，再次煥發出政治生命力。

我們需要注意到東亞與歐洲政治的變化。當下的東亞是一個民族國家普遍自立自主的世界，在國家民族平等的大前提下，它所謂的回歸常規是在於：其一，這個地區國家間的經濟政治文化往來日益增多，經濟一體化程度日益提高，且地區內國家對經濟政治一體化的期望也越來越多，這種現實與理想令人想起曾經作為自立自為、混然成體的往日東亞；其二，地區內國家對本區域傳統大國如中國、日本重新寄予很大希望，在平等參與的同時又主張它們負擔更大責任義務，為區域生活提供更多公共產品。而歐洲國家則重新致力於立足本地區來實現各自的國家利益與理想，近半世紀以來的一體化和形成歐洲聯盟的實踐容易使人想到往日的歐洲協調。法德等國的政治軍事合作與十九世紀的梅特涅體系並非沒有冥冥中的藕合，梅特涅體系以歐洲君主正統主義作為價值共識和共同制約——與梅特涅體系時代一樣，今天的歐洲也認為它們具有相同的價值觀與行事準則，如法律精神、超民族國家信仰與對國際組織和制度的尊重等，這一共同性正被歐洲視為自身的正統，並且試圖將它推廣普及成為世界正統。

大國都有在世界事務中發出自己聲音，和堅持自身獨立性與在自己所屬的地區性地緣政治體系中排斥外來支配力的自然傾向，這一意志不可能長期被壓抑。歐洲與東亞這兩個歷史性世界體系的蘇醒，也意味著這兩個區域的那些傳統核心國家，又重新煥發起其大國激情。歐洲在拋棄近半世紀以來美國附庸者角色、恢復其傳統政治意志、凸顯其政治獨立與自主追求後，作為歐洲大國的世界雄心的變種，今天的歐洲大國沒有改變其傳統理想——即對世界政治的主導權，但改變了其實現政治抱負的手段與方式——不再局限於歐洲範圍內、而是與歐

洲之外的全球性支配性強力展開競爭。這要求歐洲大國間必須步出歷史上曾經有過的絕對對立，而再次重現傳統的歐洲協調甚至實現大國聯合。二十世紀下半葉以來的歐洲不言而喻明白這一點，兩次世界大戰中的內部對立不僅使歐洲喪失了近世以來對於全球的權力優勢，也喪失了自身對於世界的文化優勢，歐洲的學生美國後來居上成為老師凌架於歐洲之上成為了新的文化發言人。這一歷史教訓使所有的歐洲國家特別是大國都無法釋懷。

三

局限於歐洲範圍而言，當下的歐洲政治範式業已更新。正如以往人類政治的範式變革需要有大事件作為催化劑一樣，歐洲政治從一種狀態走向另一種新狀態，是通過近十餘年來的一系列事件——柏林牆倒塌、蘇聯解體、俄羅斯民主化、波黑戰爭、科索沃戰爭及「9.11」事件和阿富汗戰爭等所激發和促成，而最近、也是最大的一個觸發機緣，則是剛剛成為歷史的伊拉克戰爭，它使歐洲政治中那些久矣積累、潛而未發但又躍躍欲試走進前台的事物，一下子噴湧而出由隱而顯。這些由歐洲政治常規規約的顯明化了的事物包括：歐洲傳統大國如德國相對於美國的主體意識的覺醒；在歐洲經濟一體化並發行共同貨幣歐元後，歐元業也威脅美元的世界主流貨幣地位，美歐之間的金融之戰趨向激烈；歐洲重新恢復文化自信和文明優越感，更加強調和伸張歐洲特性。而從世界範圍而言，大國之間的市場與資源爭奪，雖不像一戰之前那樣劇烈而難以調和，但相比冷戰期間和冷戰剛剛結束後的一段時間內來論，卻又殊為緊張和驚險。

歐洲與東亞國際體系的復活、世界政治又流露出走向傳統的大國政治時代的跡象，與美國自參加一戰後、正式成為全球性世界體系有機一員以來的戰略傳統嚴重抵觸。如馬漢所說的美利堅民族的擴張主義傳統，在「9.11」事件後被進一步激發，美國將以更加旺盛的意志致力於在全球推廣其價值觀與意識形態，為使其成功，美利堅民族相比以往更重視實力的全球部署與運用。今天的美國在全球層面非常類似於英國在歐洲區域的傳統志向：做一個離岸平衡者，但與英格蘭民族等到均勢受到直接威脅後才挺身介入的傳統手法不同，美利堅民族則是設法營造均勢、並凌架於世界各主要地緣政治區域之上、防止挑戰的發生。自近世以來，作為海洋國家的英國最不願意見到的局面，就是一個大陸國家——或者法國、或者是德國，主宰歐洲大陸和取得大西洋海權，如此一來英國將徹底成為大陸外的一個小島，並且自身安全將無法保證。作為英國傳人的「歐亞大陸海岸外的一座島嶼」（基辛格語）的美國在二十一世紀的擔心與以往的英國如出一轍，她不能容忍歐亞大陸被一個大陸國家或者國家集團所控制，「歐亞大陸的資源與人口都遠遠超過美國。不論冷戰存在與否，單一個大國主宰歐亞大陸兩大範圍之一（歐洲或亞洲），都會對美國構成戰略意義上的危險。」⁸而目前能做到這一點的，並非單純是布熱津斯基所說的「地緣政治棋手」，作為各別力量，她們不可能挑戰美國的霸權，然而，一旦她們實現某種形式的聯合——哪怕是其中的一兩個國家，那麼，就可能出現美國所不願意見到的局面。因是之故，美國在全球範圍內構築其海權體系的同時，還必須以武力在陸上的存在，在歐亞大陸的那些大國——法國、德國、俄羅斯、中國，或許還應該加上印度之間縱橫擺盪，盡量製造她們之間的分立，以維持美國控制下的歐亞大陸的均勢。伊拉克戰爭中作為海洋國家的美英西的聯手及與作為陸上大國的法德俄等國的對立，正好便反映了近現以來兩種不同地理國家間即傳統的海權與陸權的競爭，海洋國家為實現全球控制不僅要取得制海權，還要想方設法使陸權四分五裂。

美國以伊拉克為契入點、選擇中東開刀，以及即將將在德國的美國兵力換防部署到東歐國

家，它的地緣戰略意義，也正是將歐亞大陸的那些可能聯為一體的地區性大國一分為二——歐洲的法德，和亞洲的俄羅斯、中國與印度。由於美國前所未有的在東歐的軍事存在，俄羅斯在軍事上名符其實將成為亞洲國家。這些可能挑戰霸權的歐亞大陸被一分為二尚是美國營造地緣政治優勢的第一步，在歐洲，她仍將借助英國、西班牙等傳統海洋國家及傳統上一直對德國和俄羅斯心存畏懼的東歐國家，將她們結合起來作為對法德歐洲權力的制衡；而在亞洲，她仍將以日本為主要戰略支撐點，加強在此地區的軍事存在，嚴密防範中俄印的結盟，精心構築有利於美國操控的亞洲均勢。

四

從全球層面來說，今天又回到以往那種大國林立、並相互制約尋求建立某種均勢的時代。在舊秩序已經被破壞的時候，新秩序將是甚麼呢？將取決於這種在存在一個超級強力的同時又表現出來的權力分散化趨勢的未來演化情況。具體說來，未來秩序是在以下三種態勢的競爭衝突中產生：1) 美國及其盟友一邊佔有實力優勢，一邊其新保守主義邏輯與價值觀得到世界多數國家的支持；2) 美國及其盟友佔有實力優勢，但其價值觀得不到世界大多數國家的支持；3) 美國的實力運用遭遇到法德俄中印等大國的聯手抵制，同時後者所倡導的多極化及法律至上價值觀受到世界多數國家的認同。第一種情況將意味著「美國治下的和平」即具有一定穩定性的美國全球獨霸；第二種情況將可能迎來刺刀威脅下的不穩定的美國獨霸，更可能意味著世界戰爭，就如同一戰之前的情勢一樣；第三種情況更為複雜，可能意味著戰爭，但更可能意味著在某種價值共識下的具有一定穩定性的多極體制的到來，就如同三十年戰爭及維也納會議之後較長年份裏的情況一樣。

註釋

- 1 斯塔夫里阿諾斯 (Leften Stavros Stavrianos) 著，吳象嬰、梁赤民譯：《全球通史——1500年以後的世界》（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2），頁579。
- 2 布羅代爾 (Fernand Braudel) 著，顧良、張慧君譯：《資本主義論叢》（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7），頁121。
- 3 布羅代爾 (Fernand Braudel) 著，顧良、張慧君譯：《資本主義論叢》（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7），頁161。
- 4 基辛格 (Henry Kissinger) 著，顧淑馨、林添貴譯：《大外交》（海南：海南出版社，1997），頁217、751-752。
- 5 基辛格 (Henry Kissinger) 著，顧淑馨、林添貴譯：《大外交》（海南：海南出版社，1997），頁150。
- 6 馬漢 (A. T. Mahan) 著，蕭偉中、梅然譯：《海權論》（北京：中國言實出版社，1997），頁206、208。
- 7 程亞文：〈常規秩序與異態衝突——對亨廷頓『文明衝突論』的另一種詮釋〉，《歐洲》，1998年第6期。
- 8 基辛格 (Henry Kissinger) 著，顧淑馨、林添貴譯：《大外交》（海南：海南出版社，1997），頁753-54。

© 香港中文大學

本文於《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二十三期（2004年2月28日）首發，如欲轉載、翻譯或收輯本文文字或圖片，必須聯絡作者獲得許可。